

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 续篇

徐日辉 著

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

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 续 篇

徐日辉 著

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 续篇/徐日辉著, —中国: 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 2005. 2 月

ISBN 988-98276-1-1

I. 史… II. 徐… III. 史学理论-历史研究
IV. K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05)

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 续篇

徐日辉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

排 版: 新天地文印中心

印 刷: 新颖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1.8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5. 2 月

书 号: ISBN 988-98276-1-1

定 价: 24.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史记》体大思精，是学术界公认的一部“百科全书”。正由于此，阅读和研究《史记》有很多话可说。尽管《史记》自问世两千多年以来，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和读者阅读和研究，发表的论文论著不计其数，但仍然有许多话题可说，不仅不会出现题无剩义的局面，而且《史记》蕴含的思想有永远开掘不完的价值。就拿《史记》五体之一的“八书”来说，内容博大精深，至今留有许多未知领域有待探索。例如，司马迁为什么作“八书”？为何其数为八？“八书”顺序有无深意？司马迁与班固相隔未远，而《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相较，却有很大的差异。马班比较是一个传统课题，汉末王充已发其端，争论了近两千年，而“八书”与“十志”的比较，却很少提及。也许“八书”与“十志”都难读，内容太博大，难点最多，深入探讨不是一件易事，所以在《史记》研究与马班研究中都留下许多空白。徐日辉君师从于余研究《史记》，并结合他的考古知识欲有所展。1996年我有幸参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规划“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的机缘，提出了“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的课题，徐日辉承担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劳作，徐君获得了二十余万字的成果，于2000年9月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徐日辉君研究《史记·八书》有以下三个突出的贡献。《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全书七章，内容为：一、八书的题名；二、八书的序列；三、八书的旨意；四、八书的重构与扩展；五、八书产生的历史条件；六、八书对中国文化的直接影响；七、八

书的历史地位。从全书的这一分章布局，可以看出，作者突出对“八书”的创作旨意及思想内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视角宏观，论述全面，回答了许多隐微的问题，也是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探索“八书”的构成及其价值的论著，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是“史记学”百花园中绽放的一朵奇葩。这是第一个贡献。

但是，徐日辉君并未止步，他继续深入，把《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的比较列入了攻关项目，着重阐发《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相比较中《史记》的未立项目，即司马迁为何不立“刑法”、“地理”、“艺文”、“五行”等门类。结论认为：不立“刑法”，“是对现实政治的公开抗议，旨在恢复传统的礼乐制度，净化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不立“地理”，是在“德配与地理的思想主导下，不为汉武帝穷兵黩武的盛世疆域张目”；不立“艺文”，一是秦火之后文献缺失；二是“艺文”不合八书寓意，“不愿为汉武帝时代穷经而经亡的‘学术繁荣’贴金”；不立“五行”，乃是“破除迷信，摈弃五行”。这些议论，既有合理的内核，深挖司马迁书与不书的微言大义，亦难免有偏颇之嫌，但徐君第一次探微，揭示司马迁春秋笔法的尝试是可取的。徐君的尝试，开拓了多向思维的境界，可备一家之言，启示来者再探索，发明新义之功不可没。可以说，徐君即将推出的《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续篇》，填补了马班比较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这是第二个贡献。

徐君的研究成果，还有一大特色，大量引证考古新材料，使立论证据充实，亦更具时代色彩，精义迭出。这是第三个贡献。

徐君书成，索序于余，欣然命笔，已陈体会于前。意犹未尽，在此，借花献佛，略抒一点浅见，既与徐君共勉，亦以此就正于方家。

“八书”载朝章国典，即把国家大政纳入史学范围，这是司

马迁的创造。司马迁以“书”之名为题，司马贞解读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史记》）卷二十三《礼书·索隐》）。据此，“八书”是囊括国家大政，以今日言之，是分门别类的文化专史，开后世各种典志体专门之学的先河，所以内容极其丰富。古代《尚书》是各种体裁的公文档案汇编，司马贞以“五经六籍总名”释之最确。班固著《汉书》，因总题为“书”，所以改“书”为“志”，并扩大内容为“十志”。后之作者，依仿班志，《汉书》以下诸纪传史，皆称之为“志”。“八书”首创，“十志”相承，渊源有序，马班比较，切不可班志为标准，反推“八书”之失，或某书某志缺如。

司马迁只作“八书”，不立“刑法”、“地理”、“艺文”、“五行”，以及“食志”等五门，要依据司马迁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他所承继的前代资料来探求，而不应以《汉志》的有无为标准，这是必须把握的一个基点。

先秦时代，国家大政被归纳为“八政”，见于《尚书·洪范》，司马迁非常熟悉，写入《宋微子世家》，以周武王问政于箕子，箕子答以九条，其中第三条便是“八政”。“八政”依次是：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史记·八书》与之对应，礼、乐对应宾，律对应师，封禅对应祀，平准对应货，相对应者只有四政。“八书”缺“食”、“司空”、“司徒”、“司寇”四政，而增设“历书”、“天官”、“河渠”三政。由此可见，司马迁所立“八书”，自有其思想旨趣，不是简单的缺与不缺。徐君的研究作了许多探索，这里不多说。

《史记》在“八书”之外，立有十篇类传，其中多有国家大政。例如“循吏”与“酷吏”，可代司寇，即“刑律”之政；“儒林列传”可代“司徒”之政；“货殖列传”“平准”为表里之文，是相辅与相承的姊妹篇，合为货政。此外，《夏本纪》详载大禹治水，划分九州，厘定贡赋，既有司空之政，又含地理之政。这说

明，司马迁关注的国家大政，并不限于“八书”所列，古代亦不止于八政，而是书志所列以及排列顺序表现了史家以及当时社会所认定的重大之政。司马迁以礼、乐居第一、第二，取代《洪范》以食、货居第一、第二，显然是维护秦汉时代大一统政治强化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的需要而升华的哲学观念，同时这也是升华孔子“足食、足兵”而“民信为先”思想的政治体现。

“职官”是国家大政的要件，儒家五经典籍中就有一典曰“周礼”，又称“周官”，专论官政，讲的是国家机构。《史记》列在“十表”之中，有“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班固仿之，作“百官公卿表”，详于“史”表，范曄《后汉书》升格设立“职官志”。在这一点上，范书优于《史》《汉》，也说明了史学的发展脉络，某些方面是后来居上。

“八书”寓含先秦八政观念，只是一个因素。《史记》五体，总数一百三十篇，各体分数，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这些数目均有特定含义，《太史公自序》以及三家注均有明确的阐释。张守节说：“八书，有八面，法天时之八节”（《论史例》）。徐君进一步上溯先民创“八卦”对“八”这一数字的神秘观念，以及五行哲学对司马迁的影响，很有见地。无论司马迁有怎样的哲学思考，而从国家大政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囿于“八书”其数为“八”的极限，省立“刑法”、“地理”、“食志”等门类留下遗憾，也恰为班固提供了用武之地，而列传所书国家大政，受其传记体例的局限，是不能与书志相提并论的。也就是说，班书“十志”，比迁书“八书”的内容更为博大，更符合史学的完整性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我们再具体分析，《史记·八书》不立“刑法”、“地理”、“食”三门是真谓之“缺”，即应立而未立者曰“缺”；不立“艺文”，是条件未备；不立“五行”，是破除迷信，不从流俗，此乃司马迁的卓识远见。

以上议论，权作是笔者对《史》《汉》两书之书志比较的断想，意在说明，此课题的研究还有话可说，还有待深入，也可以说是《史记》研究永无穷期的一个例证。

是为序。

张大可

2005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一 《史记·礼书》之背景考察	1
(一)《礼书》的渊源	1
(二)汉初“礼”的资料缺佚	21
(三)礼崩乐坏的沿续与现状	26
二 《礼书》的社会意义与实践	45
(一)《礼书》的社会意义	45
(二)礼与《礼书》的社会实践	66
三 司马迁与《礼书》	104
(一)治国、正身与规范	104
(二)发展与演进	122
四 八书阙《刑法书》研究	140
(一)八书的阙门	140
(二)阙《刑法书》是司马迁治世思想的实践	144
(三)阙《刑法书》是司马迁对现实政治的公开抗议	151
(四)阙《刑法书》旨在恢复传统的礼乐制度， 净化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	162
(五)阙《刑法书》寓意“刑余之人”以诫告后人	166
五 八书阙《地理志》研究	173
(一)司马迁与盛世疆域	173

(二) 司马迁对传统地理文化的继承	178
(三) 安邦定国与司马迁的地理思想	187
(四) 司马迁笔下的地域文化与经济特色	192
(五) 排除地理障碍, 加强民族团结	201
(六) 司马迁德配地理思想的高度概括	208
六 八书不立《五行书》研究	212
(一) 不为迷信的“五行”作伥	212
(二) 司马迁对阴阳五行的认识	216
(三) 破除迷信, 摈弃五行	228
七 八书不立《艺文书》研究	241
(一) “秦火”及《挟书律》之余孽	243
(二) “艺文”不合八书寓意	255
(三) 以《要指》为纲目, 纵论天下学术	259
(四) 以人代学品评各家流变得失	269
八 八书、十志序列比较研究	293
(一) 八书溯源与序列	293
(二) 十志与八书序列比较	307
九 八书与数“八”及数	315
十 八书与礼乐制度	337
主要引用书目	353
后 记	366

一 《史记·礼书》之背景考察

《礼书》是《史记》八书之首，司马迁之所以序列第一，“用义尤深”，“盖痛古礼遭秦而废，历汉五世而终不能兴也。”^①这是清代学者方苞在书《礼书序》后发出的感慨。考察表明，司马迁著《礼书》目的就是突出一个“治”字，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说：“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②。开宗明义非常清楚，表明礼在治世中的特殊功能。在《自序》中他又重申：“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司马迁郑重地提出宰役群众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者，只有“礼治”，并且将礼乐制度贯穿于整部《史记》之中，作为“究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有机构成，也是我们研究司马迁《礼书》的主线。

（一）《礼书》的渊源

礼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更是人类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礼的出现使人类社会由无序走向有序。因此上讲，礼的核心是“治”，作为法律之外的有效补充，礼既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规范与准则，同样也是整个社会运作稳定的保护机制。作为人类高度文

^① 《方望溪全集》卷二。

^② 《史记·礼书》。

明的表现，礼起源很早。司马迁说：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①。

意思是说礼起源于人文始祖伏羲及尧舜时期。此说颇值得研究。《白虎通义》载：“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詒詒，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则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于是伏羲仰观于天，伏察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伏羲，又作虑牺、宓羲、包牺、庖牺、炮牺、羲皇等，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生于甘肃天水。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伏羲是否真有其人，如同炎帝黄帝一样，今天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伏羲作为时代的代表，尤其是他发明了八卦^②，将中华文明带入到一个新的理性境界。《系辞》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以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田以渔盖取诸《离》。

《系辞》出自春秋晚期孔子所传，这短短的 72 字，是关于伏羲最早的记录和描述，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系辞〉》中的记载完全一样^③，据司马迁“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的记载^④，知上述 72 字乃是孔老夫子所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徐日辉：《伏羲与伏羲文化概说》，载《甘肃省高师学报》1996 年 1 期。

^③ 陈松长：《帛书〈系辞〉释文》，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

^④ 《史记·孔子世家》。

为，并且在出土的《帛书〈二三子问〉》中得到了相同的证实^①。八卦作为中国最早的哲学形式，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根据专家们的研究表明，画八卦，乃是用符号来代替结绳记事。所谓的观天、察地、取身、取物，实际上就是生产、生活的不同实践。依据有关专家的观点，伏羲画八卦，最初是用记号或用符号来代替古老的结绳记事。赵逵夫先生提出“卦者，挂也。‘八卦’开始之义乃指垂挂着的八条绳索，用以记数、记事”^②。也有学者认为八卦起于占卜。现在看来，八卦首先是一种符号，既记数又记事。即便是占卜，首先还是“数”，至少是单双数的组合。如果文明程度达不到一定水平，数的组合是很难排列出来的。至于用“数”来喻事，又必须经过一定的历史积累，或者说经验积累才能完成。更何况八卦起始未必就是占卜。从现存的周初完整的八卦画卦图形看，与今天画卦之图形完全一致。可知当时的画卦首先是记数，由记数发展到记事，由记事扩大而演进，并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才最终形成。如乾（☰）是最大数，代表无限的天；而坤（☷）是最小的数，代表有限的地等；再加上风；雷；火；水；山；泽等构成了古人所能认识的具体的世界万物。对此，赵国华先生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中提出伏羲八卦作为母卦，源于对“数”的认识，来自西安半坡文化对鱼的数量认识及内含生殖意义。

至于在《系辞》所说“盖取诸《离》”者，乃六十四卦中的离（☲）卦。其意：《彖》曰：

^① 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

^② 赵逵夫：《八进制制子遗与八卦的起源及演变》，载《伏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是以畜牝牛吉也。

这是说如日月附丽于天，能普照天下；百谷草木附丽于地，能使五谷生殖，又能饲养动物发展畜牧，与伏羲“以田以渔”是相吻合的。而“化成天下”者，就是以文化天下。《贲》卦《彖》曰：“刚柔相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即人化、人文化。所谓文化者皆源于此。

这个化成是文化而成，而不是武力所成。因此《战国策·赵策》称“伏羲、神农教而不诛”，正是礼制的具体表现。另外，涉及到礼制的还有：

1. “制嫁娶，以俪皮为礼”^①，说就是用鹿皮一分为二，各执一片为婚娶之凭证。结束群婚，进入一夫一妻制的时代，这是人类自身发展的一次重大变革。

2. 制礼以教化天下。《系辞》称伏羲“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的正是制礼的过程。《礼记》称：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醕。治丝麻，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

礼起源很早，至少在新石器时代部分就已经形成，最初表现在人类的祭祀行为，后来演变为一种组织程序的行为规范。李泽厚在

^① 见《古史考》。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称“将其群体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按着一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进行生产和生活，以维系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活动。”所以司马迁在《礼书序》中说：“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未尚矣”。《周易名乾凿度》称伏羲“理人类而明王道”，就是司马迁所讲的礼“通王道”而“经纪人伦”^①。这是文明的表现，也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表现。

3. 制琴瑟作乐。《礼记》称伏羲“作琴瑟以为乐”。《孝经钩命决》称“伏羲乐名《立基》，一云《扶来》，一曰《立本》”。又《拾遗记》称“灼土为埙”，埙是中国最古老的陶质乐器之一，在距今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遗址中得到了证实^②，至今仍在甘肃天水一带民间流传，俗称“哇呜”。另外，在距今5900年前后的大地湾三期文化中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陶鼓，与陶埙共为中国乐器之最。乐与礼配伍，是为礼乐制度的主要构成，与我们这个文明社会同步而行。乐由最初的渲泄，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③，乐担负着统一行动的功能，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也是进入文明时代的特殊产物，并且已经得到了现代考古发现的印证^④。

“礼”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的一种标记。正如钱穆先生所讲：“中国之所以成为民族，就是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的准则”，“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也是政府的准则”^⑤。那么，礼到底是什么呢？《礼记》称：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张朋川：《甘肃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塑》，载（香港）《中国文物世界》第58期。

^③ 《礼记·乐记》。

^④ 张德芳：《伏羲、女娲与河陇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载《丝绸之路》1997年5期。

^⑤ 邓尔麟：《钱穆下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礼记》是我国流传久远的一部有关礼仪的典籍，今本《礼记》大约从战国一直延续到汉初，非一人完成，其中汉初儒家的比例最大^①，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政治。礼的本质是将原来人与人自觉遵守的一些行为规范，上升为统治者的意志，并推行于社会，成为社会必须遵守的普遍秩序。通过礼仪、礼乐制度使社会凝聚力加强，成为一个有机体，使其正常有序地运行。

对于礼产生的原因，司马迁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证。他说：

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

^① 余敦康：《礼记》，载《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家名著评述》，齐鲁书社1984年版。

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雕敝”^①。

这是司马迁经过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所谓“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讲的正是礼的发生与发展。所以《吕氏春秋》称：“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群，众也。而人备可完矣。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②。从社会发展看，文中所指当是原始社会，不过描写的过于美好，因为原始社会也有“礼”，而且至少在距今5000年前就已经形成，只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主要处于饥饿状态，因而不像后来那样突出罢了。就此荀子说：

礼起于何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竿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檼貌、越席、床第、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③。

从荀子这段议论，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人眼里，礼首先是平衡

^① 《史记·礼书》。

^② 《吕氏春秋·恃君览》。

^③ 《荀子·礼论》。